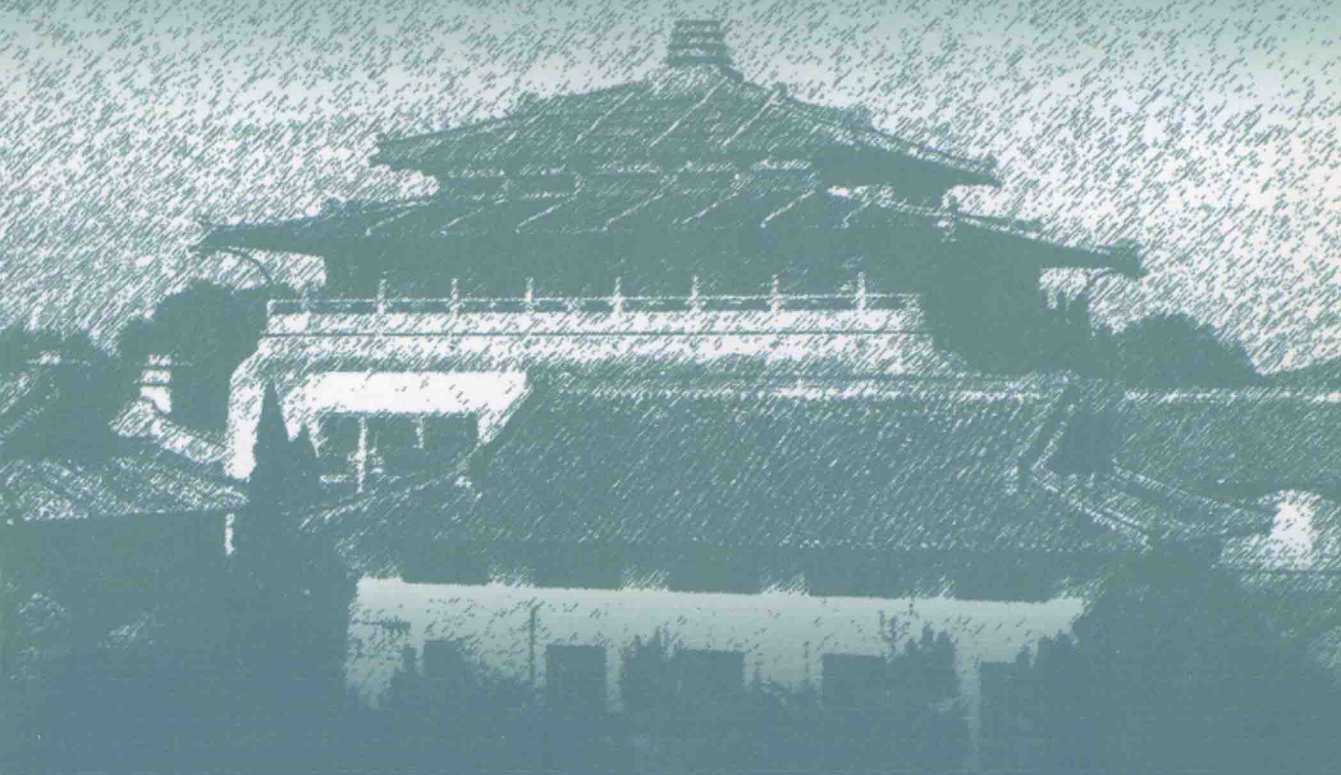


长江学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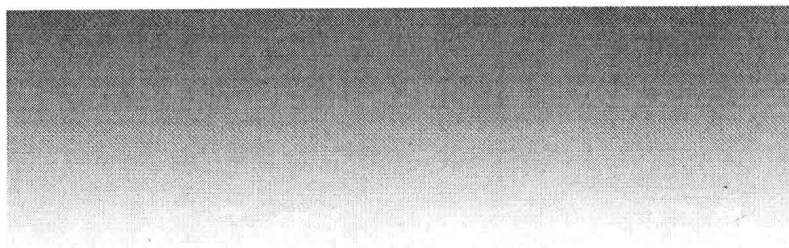


第八辑

武汉大学文学院 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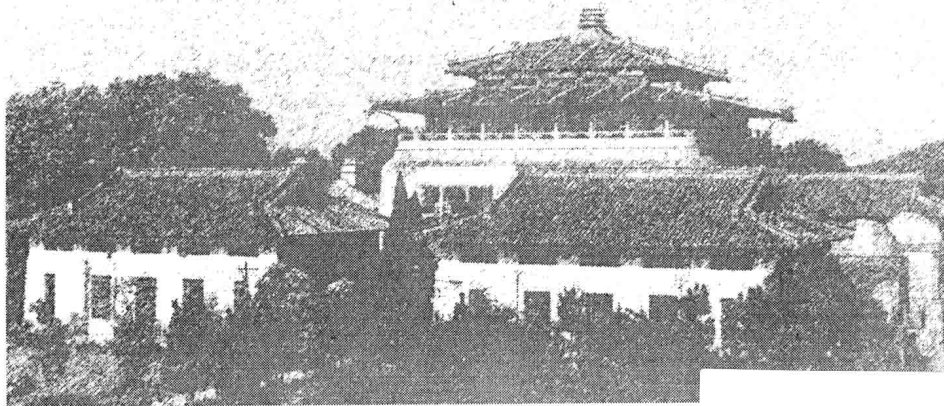


长江学术

第八辑

武汉大学文学院 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CHANGJIANGXUESHU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江学术/武汉大学文学院、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ISBN 7—5354—2332—9

I. 长…

II. 武…

III. 学术论文—中国—当代

责任编辑:常江 责任印制:吴竹敏

封面设计:小加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B座9—11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市精伦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8.25 插页:1

版次:2005年6月第1版 2005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432千字 印数:1—2000

I.1794 定价:30.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於可训 我出生在禅宗的发祥地湖北省黄梅县，但从小到大，却未曾遭遇过禅修的环境。恰恰相反，倒是歙县的一种地方戏——黄梅戏，颇似我个人的经历，即在故乡出生，在外乡长成。我1947年农历3月出生，幼从母学，在家乡接受启蒙教育，1960年考入黄梅一中。1963年考入黄冈高中，这虽是一所全国闻名的重点中学，但黄州却是苏东坡的流放之地。来此求学，也似乎是从家乡将自己永远地放逐于外地，后来的事实果真如此。1966年高中毕业，被卷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久便“上山下乡”，于1968年下放到黄冈县一个名叫路口的地方，当了一个“知青”户的“家长”。所幸与天地作战不过一年又七月有余，1970年便被招入黄冈地区一家机械厂当热处理工。1974年调往武汉铁路局当了一名调车工。这工作俗称“车猴子”，作业时，要在跑动的火车上爬上爬下，危险至极。也许是因为这份工作过于危险，所以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才想起了到大学去寻找一份安全。这年我考入了武汉大学中文系，1978年初入学。我的大学生涯，正处在除旧布新的年代，从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大多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倒是自己在课外鼓捣的那些个名堂，后来影响了我的生道路。我就是在这期间由爱好诗歌、参与校园文学活动、创办学生文学刊物，到开始文学评论写作，一步一步地走上今天的这条人生之路的。

1982年初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其间虽数度出入“官”场，但终究未离本业。当是时也，正值中国文坛风云际会，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因为搞了一点文学评论，也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卷入了一个据说是“崛起”的文学评论队伍，被人送了一个外号，叫作“文学评论家”。迄今为止，我写作的文学评论文章，已经结集的计有《小说的新变》、《批评的视界》、《新诗史论与小说批评》。除了这些文学评论文章之外，还有一些便是与我的饭碗有关的所谓学术研究方面的著述了。这些东西主要有《新诗体艺术论》、《当代诗学》、《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文学风雨四十年》（主编）《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主编）、《中国现当代小说名作导读》（主编）等。这些论著也曾受过各种奖励，算是社会和同行的一种肯定。我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被选为湖北省作家协会和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的副主席，还“客串”着中国写作学会常务副会长，曾主编过一本名为《通俗文学评论》的刊物，现在还受命编着《长江学术》和《文艺新观察》两本刊物，此外，还做过其他一些可说可不说的事情。我现在的愿望是在教书之余，读一点我想读的书，写一点我想写的东西，别无他求。我离家乡已久，那种禅修的情境，是注定不能再回去领受的了，但古人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是之谓也。

张思齐 1950年5月生于重庆市一爱国人士家庭。1982年元月毕业于重庆师院外语系，获学士学位。1987年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获硕士学位。1992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长期在涪陵师院英语系工作。1994年元月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兼职：中国诗经学会理事、湖北省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

张思齐教授主要从事英国诗学、中国诗学、比较宗教学、比较文论等方面的研究。已发表专著有《中国古代接受美学导论》、《诗文批评中的对偶范畴》、《六朝散文比较研究》、《宋代诗学》、《中外文学的比较与共生》等，论文百余篇，译著有《日欧比较文化》等，编著有《中外文学名著十日通》（主编）、《宋词精华》（副主编）、《外国文学史》、《比较诗学概论》等。文学创作以诗词曲赋为主，发表了400余篇（首）。系统地学习过拉丁文和梵文。英、日文能写作。德、法文能阅读。英、日、德文有少量翻译作品发表。1996—1997在剑桥大学访学，主修唐代文史，其间发表英文诗3首。为本科生开设过外国文学史、比较文学、中西比较诗学、英语戏剧选讲、英语散文与写作、基督教文化史与文学、道家文化与道教文学、中西文化比较等课程，为研究生开设过比较文学史论、近现代世界文学理论比较批评史、东方文学等课程，还为各种国际班讲授过拉丁文、诗经楚辞等课程。2003—2004在哈佛大学访学，主修宋以来的中国历史文化。自1997年起，率先在武汉大学用英语讲授专业课，开展“双语教学”，受到肯定。已经完成的汉译英课题有《中国哲学史》（萧□父、李锦全主编，外文出版社委托项目）。





中国当代文学学科

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是湖北省重点学科，于1990年批准为博士点。这一学科点由著名文学史家刘绶松先生在解放初创建，位居全国前列。经后继者陆耀东、易竹贤、孙党伯、陈美兰诸位教授的努力建设，现已在一些重要的学术领域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老一辈学术带头人陆耀东、易竹贤、孙党伯、陈美兰等教授，中青年学术骨干现有於可训、陈国恩、张洁（昌切）、樊星、方长安教授，学术带头人为於可训教授。

本学科点的研究覆盖面广，在许多重要领域都有厚重的成果。

1、中国新诗研究方向。致力于诗论、诗人论、新诗史、新诗流派史及新诗流变规律研究。重要成果有陆耀东的《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徐志摩评传》和《冯至传》，龙泉明的《中国新诗流变论》、《现代诗学》，於可训的《新诗体艺术论》、《当代诗学》，以及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重要刊物上发表的200余篇新诗研究论文。该方向居国内一流水平。现致力于新诗史和新诗综合性研究。

2、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方向。易竹贤的《胡适传》是新时期率先研究自由派作家的厚重之作，易竹贤、陆耀东、孙党伯的鲁迅、郭沫若、闻一多研究，国内领先。陈国恩的《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外文化》，昌切的《思之思——二十世纪中国文艺思潮论》、《清末民初的思想主脉》、《世纪桥头凝思》，樊星的《世纪末文化思潮史》、《别了，20世纪》，方长安的《晚清到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等著作，是新近的优秀成果。现致力于文学思潮发展演变规律及思潮比较研究。

3、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方向。陈美兰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研究领域国内领先，代表作有《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等；於可训、昌切、樊星的当代小说评论与当代小说综合研究，成果突出。这些方面的成果主要有於可训的《小说的新变》、《批评的视界》、《新诗史论与小说批评》，樊星的《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等。金宏宇的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版本研究，锐意拓新，代表作有《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现致力于20世纪长篇小说整体研究和20世纪小说叙事研究。

4、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方向。於可训、昌切、樊星等追踪并研究当前文学的动向，已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相关成果详见前述）。现致力于在多维文化背景中研究当代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和冷战格局中的中国当代文学形态。

本学科在教材建设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於可训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论》（修订版），龙泉明主编的《中国新诗名作导读》、於可训主编的《中国现当代小说名作导读》（上、下）、陈国恩主编的《中国现代话剧名作导读》等。这些成果已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获得过多种奖励，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本学科点追求稳健、扎实、锐进、拓新的学风，文史兼治，注重实证，关注前沿，在全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显示出鲜明独特的治学风格。本学科点承担国家级及省部级科研项目较多；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重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多，转载频率高；获得国家性和省部级科研奖项多，培养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产质量较高。在全国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长江学术

学术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松山(德国) 川合康三(日本) 王宁 王润华(新加坡) 乐黛云
叶嘉莹(加拿大) 朴宰雨(韩国) 严家炎 陆耀东 李欧梵(美国)
何莫邪(挪威) 易竹贤 岩佐昌璋(日本) 郑远汉 宗福邦 项楚
郭锡良 袁行霈 钱中文 章培恒 裘锡圭

编委会:

主编:

尚永亮 周百义

副主编:

於可训 卢烈红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学锋 刘礼堂 张思齐 张荣翼
骆瑞鹤 黄义和 熊礼汇

编辑部主任:

乔惟德

本辑执行主编:

於可训

改刊致读者

由武汉大学文学院和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长江学术》论丛，自 2002 年创办以来，已出了 8 辑。最近，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长江学术》已获得正式刊号。从 2006 年起，本刊将由一年出 2 辑的学术论丛，改为一年出 4 期的学术期刊（季刊）。改刊后的《长江学术》由武汉大学主管、主办，《长江学术》编辑部和杂志社编辑、出版，仍坚持既定的办刊宗旨和办刊方针，编辑出版发行工作将严格按现行学术期刊的规范和要求运作。明年，《长江学术》将以一个全新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

本刊自创办以来，得到了广大读者、作者和学界同仁及有关部门的诸多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致竭诚感谢之意！改刊后，本刊同仁将一如既往注重学术质量，恪守学术道德，严格学术规范，为提高办刊水平而努力工作。希望得到更多新老朋友的支持和帮助。

《长江学术》编辑部
2005 年 6 月 20 日

目 录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 现代性视野中的当代文学史的分期与历史观·····陈晓明(1)
- 宏大叙述:从解构到重构·····贺绍俊(9)
- 不可救药的误读
——读《留东外史》·····李兆忠(14)
- 感伤的行旅
——论侨寓者返乡·····叶 君(21)

跨文化对话

- 主持人的话·····昌 切(28)
- 隐喻、身体和文化:汉语对“胆”和“勇”的理解
····· [美]於 宁著 刘长庆译(30)
- 通感隐喻:一种认知学的观点····· [美]於 宁著 唐小娟译(40)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 二十世纪中国填词史话(一)·····施议对(51)

言语与言语学研究

- 言语与言语学问题····· 郑远汉(60)
- 关于语言、言语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范 晓(66)
- 关于建立言语学的初步构想·····李如龙(78)
- 从语言运用实际看建立言语学之必要·····赵世举(81)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作者之梦与读者之梦

- 以宋代诗的解释学为中心····· [日]浅見洋二著 尚永亮译(88)

- 南齐皇权纷争与谢朓之死·····李中华 章立群(97)
 “三言”述论·····杜贵晨(105)
 试论《诗》文本的音乐性特征·····曹建国(112)

古代汉语研究

- 动结式述补结构带宾语功能的历时考察·····刘子瑜(120)
 《洛阳伽蓝记》的构词法及其复音词在现代词典编纂
 中的价值·····萧红(134)
 试论《马氏文通》“读”的性质及其被误解的原因
 ······罗庆云(143)

考据·校勘

- 再论《经解入门》的真伪问题·····司马朝军(149)
 中华书局版刘宝楠《论语正义》点校疑义举例·····刘宗永(160)

文艺学研究

- 第三种文化：丧钟为谁而鸣·····冯黎明(166)
 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学经典问题·····李凯(173)
 试论文学形象的接受过程·····赵炎秋(181)
 中西诗学中的“兴”与“隐喻”·····毛宣国(187)
 关于艺术理论的理论反思·····张一伟(195)

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研究

- 印度的自然景物诗和中国的山水诗·····唐仁虎 石海军(201)
 圣经叙事中的功能性人物论略·····梁工(210)
 了不起的菲茨杰拉德和他的“梦”·····徐若芃(215)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比较文学刍议·····孟庆枢(221)

学术争鸣

“酒”通“輶”质疑

——与刘书玉先生商榷·····杨合鸣 刘莉妮(227)

硕博论坛

晚期巴金与安那其信仰·····白 浩(229)

杂语与独白

——对沈从文《长河》及荷花淀派小说的对比性阅读·····周颖菁(235)

从四个关键词看余华的小说精神·····魏家文(240)

内蒙古丰镇话里的“把”、“叫”结构套嵌式·····薛宏武 阎梦月(246)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民主思想小议·····[中国香港]何巽权(251)

治学感言

众志成城克雄关

——写在《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出版之际·····吴志达(254)

珞珈书评

读《冯至传》·····王桂妹(258)

浪漫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化的浪漫主义

——评《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外文化》·····马 萌 李继凯(263)

玄言诗研究的新创获

——评《东晋玄言诗派研究》·····张立伟(27)

前沿的探索

——评《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何念龙 李 茂(266)

评《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刘勇强(268)

学术短论

杜诗“承露金茎”是指“天枢”铜柱·····韩成武(270)

隋代文学资料补遗三则·····李建国(273)

- 史传细节质疑二则…………… 许彩云(275)
《日知录》“左氏不必尽信”条辨正……………黄觉弘(277)

博士论文撷英

- 走向全球化——20世纪晚期中国文学批评对西方现代文论的接受与运用(50) /
新文学的本原(65) / 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母题(80) /
人：小说的聚焦——论新时期三种小说形态中的人(276)

珞珈述林

- 《唐宋词流派研究》 / (274)

学术动态

- 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 研讨博士生培养中的问题

——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培养学术研讨会发言纪要

- ……………李光敏 叶立文 张园整理(280)

稿约

现代性视野中的当代文学史的分期与历史观

陈晓明

一、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分期

中国当代文学以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期起点。这个时间标志显然是一个政治时期的象征，而不是从文学本身的转折来确认的。它主要来自历史学领域的分期示范¹。事实上，所有的历史分期都是相对，文学艺术史的分期更是如此。在近现代以来，重大的历史事件成为历史分期的标志，而文学艺术只有附属于这些伟大的历史事件之下才能获得确定的历史意义。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就是充满了激进的社会变革的历史，它不可避免地以革命、断裂、开始与结束来划定一个个时间标志，而思想文化与文学艺术则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壮大声势。从这一意义来说，以政治时期来划定文学史的时期并不为过。但文学艺术又确实有其更为内在与历史传承的一面，某个绝对的时间标志，并不能把文学的历史割裂。例如，1949 年以后的当代文学，与“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就有着深层的内在联系，这不管是从现代历史变动的角度，还是从白话文学革命的语言艺术的承接关系；或是从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的传统来看，1949 年都不可能突然创造一个全新的文学历史。其实 1949 年建国以后的文学，是在 40 年代左翼文学与延安时期的解放区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后者不管是文学观念的建构，还是在文学队伍与制度的建设方面都确定了全部基础，它理所当然决定了新中国后来的文学发展道路。如果要在现代与当代之间划分界线的话，那么，这个界线的内在规定就是这个时期的文学的本质或性质，而社会主义革命文学显然是随后的文学史的本质规定。从这个随后的本质规定求本溯源，那么，其源头主要就在延安，其起源就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如果把 1942 年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标志的话，这段社会主义革命文学会显得更加完整，其来龙去脉显然更清晰得多。但这样势必侵犯了现代文学的领地，因为现代文学是从 1919 年算起，无形中少掉了 7 年，而且是挖掉了 7 年瘦肉，这是难以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人所接受的。但我以为，问题出在“近代文学”，所谓近代文学是指从 1840 年起的鸦片战争开始，到 1919 年的五四运动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在历史学上的定位也不清晰，教科书上把它看成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段，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横行的阶段。但这只是现象，中国社会历史的内在性质，它在世界史中的定位和定性还是不清晰。实际上，所谓近代就是中国现代性历史的开端，它完全可以归入中国现代历史开始的阶段，这样，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就显得更清晰，也更饱满。它就具有了起源、内外冲突，转型的历史路线图。而对于文学来说，这幅历史图景将更好理解，也具有更为深

厚的历史内涵。实际上，现在很多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都把视线扩大到近代，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也说明，在现代与近代之间有着深厚的内在联系。如果现代往前移，就给当代腾出空间，这是两全其美的划分。但要实行起来谈何容易。因此，我的见解只能是个人见解，我并不想推翻现在已经构成权威性的分期观点，但我可以把我的分期观点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因此，绕了一个圈子，还是回到原处，我只是把圈子外面和内里可能包含的东西作一分析。我的分期还是以1942年为界，我们的论述可以做些正本清源的工作。

即使是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的历史也依然需要加以分期。这主要是从论述的方便角度来考虑。这里的分期也不是那么明确清晰，还是存在不少的差异。有的论者，例如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就以1949—1978年，即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来划分为一个阶段；从1978到1989年划分为一个阶段；90年代为一个阶段。我以为1949—1976年以文革为界，这就是文革前17年与文革中的十年为一个阶段；第二阶段可以从1977年到1989年；第三个阶段可以90年代以后为一个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1世纪，22世纪，阶段划分可能又很不一样。

在我看来，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可以从1942年为起点，1942—1956年这14年为一个时间界线，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化”起源与基础建构阶段；1957—1976这20年为一个界线，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化”不断激进化阶段；1977年到1989年这12年是新时期文学阶段，它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修复与重建阶段；1989—现在，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体化转向多元格局的时期，一种历史化的解体，另一种历史化处于未知阶段。如果要做更加截然的划分，应该是1942年到1992年这50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审美领导权统治下的现代性激进化建构的中国当代文学；1992年到现在以及再住后（2042年时的又一个50年），这是中国文学在多元化的格局中现代性处于解体后完成后现代性文学建构的时期。对这样的历史过程的阐释的任务，只有交给更年轻一代的学者了。

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性质

当代文学史的划期是由其性质决定的。当代中国文学的性质何以会成为一个问题，这本身就说明了其性质之特殊。事实上，文学就是文学，任何历史时期都对它的时代的文学投下历史印记，但中国当代历史之给文学打下的印记似乎比较特殊，以至于所有的文学史都不得不阐述一下这个问题。当代中国文学是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文学，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当代文学的本质或性质由政治决定，它被确定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如此说来，那中国当代文学还有什么好谈的呢？那不都是一些政治的附属品吗？问题的难点正在于此。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充满了政治色彩，包含了太多的政治内容，以至于它几乎是由政治运动推动向前不断激进地走向极端。但不管如何，它又依然是文学，在政治之外，它还有文学性的东西存留下来。这使我们在探讨中国当代文学时，需要更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更深层的理论探究。为什么中国当代文学会如此深地卷入政治？为什么中国现代以来的革命如此

需要文学？为什么在政治革命的压力底下，文学依然会被认作文学，并且以其韧性的方式延续存在下去？所以，对中国当代文学性质的认识，并不是一个宣判式的结论，也不只是我们理解当代文学的一个基本参照，它同时还是我们对文学思考的起点。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再展开我们的文学史叙述。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当代文学史的性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本质贯穿于始终。为什么要分期？也是因为不同时期当代文学的性质有所差异。有些时期是小的差异，为了论述的方便而加以分期；而有些时期的差异就显得非常之大了，其内在性质显然不是一回事。任何人都不会简单地把中国当代 90 年代以来的文学等同于五六十年代的文学。这里我们把不同时期的性质特征作一简要分析。

1942—1956：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向社会主义文学的过渡时期。这也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源起时期。尽管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在三四十年代的国统区的左翼文学运动那里就开始兴起，就有过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但只有到了延安解放区，毛泽东发表《讲话》，才真正把五四启蒙文学转变为革命文学。一大批的知识分子汇集在延安，文学文化活动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具有伟大的革命意义。毛泽东确立了中国文学的性质、方向、任务与艺术风格。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解放区涌现出一大批革命文艺作品，在那个时期令人耳目一新。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王贵与李香香》，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贺敬之的《白毛女》等等。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 1949 的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被确定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文艺方针，它全面而深刻地支配了随后的文学艺术创作实践、制度与各种运动。围绕着毛泽东思想展开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基础建设。这一时期，一大批作品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开始创作，并取得一系列成绩，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和运动也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由此全面改造了中国作家的世界观，确定了中国文学的方向，文学事业紧密地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1956 年倡导的“双百方针”，表明社会主义文艺正朝着一个有益的方向前进。

1957—1976：自从 1957 年反右运动，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就更加趋向于激进化，社会主义文艺自身的建构已经让位于政治斗争，文艺成为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留给文艺的空间越来越少。文艺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组织动员手段，并成为思想清理运动的手段。也许在毛泽东及其共产党领导人看来，把思想牢牢的固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非常重要。而要完成这一前所未有的使命，就要使思想完全统一。文艺界的运动本来不过是社会思想清理统一的开始，但实际上，思想只存在于文艺界（及其知识分子），思想的清理与统一则陷进了这一个巨大的思想领域本身，它演变成文艺界或思想界自身无止境的清理运动。文学艺术就这样陷进了政治运动，成为政治运动一种形式。

“文化大革命”通常另列一个时期，这一另列既是把“文革”打入另册，也是为不断激进化的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上半期）开脱。似乎历史到了 1966 年突然中断，才向着另一个方向拐弯，仿佛 1966 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无疑是对历史的极大曲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历史掩盖。“文化大革命”就是中国革命激进化的必然后果；是思想文化无止境革命的辉煌顶点；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不得不迎接的高潮。这一切都与前此的历史铺垫一脉相承。这是我们在理解这段文学史，这段历史要把握住的基本观点。

1977—1989。关于这段历史，通常都把它作为一个“新时期”，所谓告别“文革”，开

辟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然而，“拨乱反正”，这个“正”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回到原来的正确的历史道路。如此看来，“文革”也就是偏离了历史正确道路，而不是一个完全从天而降的一段历史。那么正的源头就在“文革”前的时期，“反正”就是回到“文革”前的正确的革命道路上。也许还要再做一些修正，更加正确地走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只要看看那个时期作为绝对的政治律令存在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可以明白历史之根本的力量与意谓。“新时期”的文学，如果以“伤痕”文学为代表的话，以归来的右派与知青为主流，那么，其最基本的意义，在于建构一个“极左路线”所具有的超历史意义，通过把所有的历史谬误都推到“极左路线”身上，推到“四人帮”身上，而完成了历史错位之修复；并且叙述了老干部与知识分子始终对党忠诚的神话。在这里，历史始终有一种正确性的力量存在，那就是由老干部坚持的党的正确路线。通过对“伤痕”的审视，不只是赦免了历史，而是解救了一种历史，重新建构了一种历史。这个历史成为新时期的起点和基础。新时期的文学丰盛热烈，构成了这个时代主导的精神潮流。从“伤痕文学”到“朦胧诗”，从改革文学到知青文学，从“现代派”到“寻根派”，这样一种宏大而结构层次分明的文学史，是人们所乐于讴歌和始终留恋的。

1990到现在。90年代的中国文学一直在80年代“新时期”的阴影底下匍匐前行，90年代的文学被描述成一种杂乱无序且浅薄无聊的文化泡沫。这显然是极不公正的看法。90年代的文学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巨大背景，回到文学本位，且受到影视文化的全面排挤，而它走向市场的步伐既不坚定，也缺乏明确的方向。确实，90年代的文学显得身单力薄，只能凭着文学本身的力量开拓一片天地。但90年代的文学更加纯粹，即使走向市场也更加富有文学本色，而不依赖意识形态的附加意义。更年轻的一批作家，在先锋派创立的文学经验基础上，谋求与时代最新的精神动向与审美感受结合的方式，探索着一条面向未来的文学之路。90年代至今缺乏一种时间距离，无法给人们冷静与反复斟酌留有余地。因此当代文学史谈论90年代到今始终是一个让人犹豫不决的问题。但时间并不能使人们看清一切真相，它所遗漏的东西可能与它所获取的东西恰好成正比。就此而言，谈论90年代能保持一种新鲜的直接感受，至少对于后来的人再来理解这段历史，不无帮助。更何况中国当代文学始终为创新变革的压力所推动，理解最新的文学现象始终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令人惊异的在于，21世纪初期，文学的制度化力量突然间得到加强，体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象征资本交换的广阔场域，它使不同的人都以各取所需的方式获得满足。

三、当代文学史的观念与方法

没有任何一个词像“历史”这个词这样让人熟视无睹；也没有任何一个概念像它一样充满歧义。一说到文学史，我们就陷入“历史”的沼泽地，而“文学史”到底与历史是什么关系？它是文学的历史，还是历史性的文学？著名文学史家洪子诚先生就发出过这样的疑问。在他那本精辟深刻的著作《问题与方法》里，他指出，当代文学史研究一开始便会遇到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其一是对“历史”的理解；其二是文学史究竟是“文学”还是“历史”；其三是“当代文学史”的可能性问题^①。作为对文学史写作有着精湛理解的文学史家，洪子诚先生提出的这几个问题都是大而关键的问题。它牵涉到文学史写作的基础、出

发点与目标。

实际上，对历史观念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到文学史叙述的观点与方式。在过去的文学史叙述中，历史观念是固定的，是确定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关于历史的一套看法，都有现成的结论。现在，更多的关于历史论述的理论知识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也不得不反思我们已有的历史观念。

1949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那一年，德国历史学家发表了他后来影响卓著的历史学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在关于历史观的意义的论述时，他阐述说道：这是为了理解自己，我们希望从整体上理解历史。对于我们来说，历史是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我们谙熟的，而且我们也是从那里生活过来的，倘若我们不想把我们自己消失在虚无迷惘之乡，而要为人性争得一席之地，那么这种对历史的回忆便是构成我们自身的一种基本成分。”^④对于雅斯贝斯来说，探究历史是展望未来、寻找自身的基础，不是预言，而是令人振奋的信念。雅斯贝斯说，历史观给我们的认知提供了场所，我们有关人存在的意识从那里找到依据，历史图景成为我们决断的一个因素。即使是在无可非议的客观性中，历史知识也决不是一堆可有可无的事实，而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活跃的组成部分。雅斯贝斯反对为了维护权力或利益而编造历史谎言的做法，他指出：“把历史当作一个整体来探究的使命，实在是一种严肃的责任感。”^④

雅斯贝斯认为，历史之作为整体，意味着它有界限。这些界限在同非历史的东西、史前和历史以外的东西比较之下才显现出来。只有在深入到具体的历史事件过程中，我们才能深入地把握住它。只有找出历史内在的统一性，也才能建立整体性的理想。

毫无疑问，雅斯贝斯的历史观是典型的现代性的历史观，宏大的整体性的与目的论的历史总体性。这种历史观在很长时间主导了现代性的历史叙事（包括历史写作与文学叙事），由于建构起整体性，历史在特定的框架内获得合理性的解释，历史事实及其之间的关系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只要建立对历史的理解与阐释，就不可避免需要这样的整体性。整体性的历史观，同时也隐含着历史的进化论与目的论，整体本身就是合目的性的建构。历史主义无疑是一种古老的思维方式，从来就与目的论结下不解之缘，它按照表面上散乱的事相隐含特定目的这种思想来建立历史联系。波普尔曾指出：历史主义的每一种说法都表达了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卷入了未来的感觉^⑤。因而，整体性，关于变化与发展的观念又贯穿在现代性的历史观念中。

自从60年代后期以来，现代性的历史观受到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挑战，后现代主义以反历史人文的面目出现，而寻求差异性的解释方式。历史不是一种合目的论的统一体，而是一系列差异的事实建构起来的解释系统。当然，后现代的“反历史性”问题显然被夸大了，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歪曲了。正如德里达一再表示的他在强调历史性，也在寻求一种历史性的解释，他声称解构就是最富有历史性的工作。显然，后现代的历史性与现代性的历史观完全不同。在后现代逐渐成为普遍常识之后，再进行完整而合目的的历史性描述则显得不合时宜，也显得困难重重而难以自圆其说。

历史学家们曾经试图找到解决的方案。既保持现代性历史叙事的相对完整性，又注重寻求那些差异性的解释关系。德国历史学家吕森（Joern Ruessen）指出，后现代的历史概念，极端地和完全地否定这样一种观念：存在着某种单一的、形成人类的历史进步的东西。

历史不是事实的实体，它仅仅是虚构的想象。后现代的元历史理论绝然不同地描述了这样的历史思考：“它不强调理性讨论与经验研究法则意义上的方法，而强调叙事的诗学与修辞特征。”⁶因而，后现代历史研究热衷于把历史经验呈现为美感性质的图景，过去的形象以其美感的气质来建构不完整的历史性。吕森试图调解后现代与现代性的历史观念的冲突，他认为我们有可能既发展出关于历史发展的普遍性的概念，而同时又接受只有多重的历史或多视角的历史思考。他阐述说：我们需要一个主导性的价值系统，一个普遍性的价值系统，一个能够肯定文化差异的价值系统。他认为：“存在着基本价值，它能够启动历史解释的策略；存在着一种价值，它既是普遍的，又是能给予多重视角与差异以合法性的。”这实际就是文化差异的相互承认与肯定的规范性原则。这种原则可以被精炼为一种认知结构，“这种结构可以增强历史方法中的解释学因素，可以为历史经验带来新的取向，可以整合人类与历时性发展的统一与文化的多样性与变异性。”⁷

在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方法已经相当普遍的情形下，我们要再保持整体性和目的论的历史观念已经非常困难了。保留住现代性的历史理念的基本观念，尽可能地吸收后现代的历史方法，这成为一个折中的调和方案。这个方法是否可行尚无多少成功的事例，但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这个方案可能显得尤为可贵而实用。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来说，这更是一项别无选择的方案。

当然，我这么说，前提是承认后现代知识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个参照系。否则就没有必要寻求这种调和。在这个前提底下，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现代性的历史观念呢？并且以此作为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基础呢？也就是说，既然后现代理论已经揭示出现代性的史学观念的弊端，为什么我们不能就势倒向后现代，而要搞什么调和？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还要保持现代性的历史叙述观念？

其一、这是知识转型的限制性问题。从一种知识型构转向另一种知识型构，并不是那容易。人们认识到一种知识的局限性，和要全然抛弃这种知识并不是一回事。知识本身具有意识形态特征，也就是说人们对一种知识的选择是投入了情感、想象、利益期待、习惯和现有的话语权力在里面。

其二、这是中国当代理论建构的既有历史条件决定的状况。当今中国的思想文化依然处在现代性的框架内，而且中国现代以来的思想文化就是现代性的文化，以现代性之观念理解现代性当然有局限性，但抛开这一框架显然不能更全面深刻地理解那些活生生的历史过程。既保持对现代性的同情理解，又揭示其中的虚妄性，这就需要现代性的理念与后现代方法的结合。

其三、作为大学课程设置的需要。作为大学的基础课程理应保持知识的延续性，遵从现有的统一的教学大纲。而现有的教学大纲无疑是按照现代性的理念设计的，它表达了在完整的、合目的论的历史观念指导下的文学史阐释。尽管说大学应该是思想最活跃最激进最富有思想变革的场所，但大学同时也是最保守最稳定最富有韧性的知识堡垒。正是这种巨大的张力，构成了大学生动激烈而有内在性的精神空间。我个人的理解，大学的基础课程应该保守些、稳定些，让学生能够从容掌握知识的历史传承变化，能够把握住知识源流的内在主潮。

因此，对于我来说，我所追求的文学史的观念与方法，可能就是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